

Bourdieu

男性统治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著
刘晖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布尔迪厄作品

Bourdieu

男性统治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著
刘晖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男性统治/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著;
刘晖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1
(布尔迪厄作品)
ISBN 978-7-300-23648-3

I. ①男… II. ①皮…②刘… III. ①男性-性社会学-研究
IV. ①C913. 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9548 号

布尔迪厄作品

男性统治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刘晖 译

Nanxing Tongzhi

| | | | |
|------|---|------|---------------------|
| 出版发行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
| 社 址 |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 邮政编码 | 100080 |
| 电 话 | 010-62511242 (总编室) | | 010-62511770 (质管部) |
| | 010-82501766 (邮购部) | | 010-62514148 (门市部) |
| |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 |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
| 网 址 | http://www.crup.com.cn | | |
| |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 |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
| 印 刷 |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 |
| 规 格 | 148mm×210mm 32 开本 | 版 次 |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
| 印 张 | 7.125 插页 2 | 印 次 | 201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
| 印 数 | 108 000 | 定 价 | 3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根植于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所代表的欧洲社会学传统，以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学术圈为背景，布尔迪厄的作品既是一个延续，也是一个断裂，是对来自不同路径的既得知识的带有批判性的系统化。如果用涂尔干与“常识”决裂的经典视角来解读的话，其作品也可以被描述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象征革命”。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布尔迪厄在一系列经典对立关系中发现第三个立场的能力，如个人与社会、心理结构和社会结构、历史和结构、自由和决定论、相对历史主义和普世理性主义、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积极投入和保持距离等对立关系。正是通过这一能力，布尔迪厄逐渐建立了一种范式，可以总结为“资本”“场域”“惯习”的概念三部曲。这一范式与反思的原则不

可分割，而这一反思的原则可以被理解为使客观化主体科学地客观化的过程：对于自我的认知，事实上在这里被视作发表关于世界现实的言论的一个必要前提。基于经验研究，布尔迪厄的作品可以被描述成一部“象征资本的经济学”（其“资本”的概念可以拆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后又可依照各个相对独立的场域，被界定为相应的特定资本）；他的“再生产理论”对于资本分配的不平等的描述（包括其中的“失败者”和“奇迹般的成功者”）印证了这一点，其象征冲突和象征革命理论（在文学领域通过分析福楼拜来展示，在艺术领域通过分析马奈来进行）也体现了这一点；再如其“实践总体理论”（在分析中呈现为惯习和场域的碰撞）；又如他的“统治关系理论”以及形式繁多的象征暴力在不同社会空间中的体现（阶层统治、男权统治、殖民统治等）；最后，他未能完成的“场域总体理论”中也呈现了这一点。

今天，布尔迪厄的作品被当代知识界的不同领域使用、引用、讨论和批判，这些领域从教育社会学到语言哲学，再到认识论，还包括了民族学、政治学、制度主义经济学。如果说布尔迪厄可以被视作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思想家之一，其作品角度的多维性和形式的多样性则使得其无法被

惯用的学科划分方法归类，无法判定其作品只属于某一学科。如果说布尔迪厄确实是一名社会学家的话，则同时也可以说他是一位哲学家：20世纪50年代末他所着手解决的正是一组哲学问题，他所采用的方法使人想起涂尔干的研究路径，后者在20世纪刚刚来临时，尝试使康德的哲学“社会学化”。而布尔迪厄也是一个“社会科学家”：正如对于他的作品不同形式的采纳和接受所印证的，他的作品涉及了大部分社会人文学科，如语言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历史学，乃至认知科学。

出于介绍其作品的目的，我想提几个在理解他的作品时，尤其是在其作品传播到遥远的国度时会产生障碍。我坚信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可以帮助读者提高逾越这些障碍的可能性，虽然这可能只是一个幻想。

首先，我们不能否认布尔迪厄文字中固有的、在语义上和句法上的理解难度。即便是内行的读者，也无法避免在理解他的作品时出现困难（当然，对于翻译者也是如此）。这一困境与他论述过程的稠密度有关，与其举例的丰富度有关，还因其经常侧面指出其引用的例子可能具有的同源性（homologie），也因其总是考虑到界定他的论述的有效条件和范围，预见到可能出现的异议或者误读，还由于他经常使用

为了切断与常识的联系而建构的概念上的习惯用语，更由于他的句子结构总是那么复杂，而这一复杂句式的建构一方面反映了社会过程相互联系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个自省的思想是如何进行的。

布尔迪厄的著作对于外行来说难以接近，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出于不同的原因，阅读起来也并不容易。除了属于知识分子们自己特有的经院环境以外，布尔迪厄的作品切断了知识分子和社会世界之间迷人的联系和知识分子与他们自身社会地位的联系，他摆脱了主体性哲学、存在主义者的人道主义、60年代末以萨特为代表的激进主观主义，也摆脱了无主体性哲学、结构主义下的反人道主义和列维-斯特劳斯所代表的客观主义。与此同时，其著作与文学哲学传统下统治整个法国知识界的理论至上主义决裂，也与支配着全世界研究走向的美国社会学所推广的实证经验主义相抗衡。正因如此，布尔迪厄的著作被主观主义者视作“客观主义”，被结构主义者定义为“人道主义”，被经验主义者划分为“理论主义”，并被历史哲学家视作“实证主义”，其著作的接受过程曾经在很大程度上由不真实的边界和人为的分割所左右，正是这些边界划分着一个国家所有的领域，并一直被布尔迪厄质疑（Brubaker, 1985）。

虽说布尔迪厄的著作具有让知识分子们感到为难的所有特质，但在理解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大概在于把其著作矮化为纯理论著作的阅读方式，以及通过这种方式来评论书中的概念，而不是使用它们。对其著作的误解一方面产生于对其研究路径的误读，另一方面来自对其研究意图的错误认识。布尔迪厄在知识生产上的实践不能被简单归类为“理论生产”：“我建构的理论工具不是为写评论或者写注释而设计的，而是为了在新的研究中使用的。”（Bourdieu, 1993 : 27）如果布尔迪厄提醒人们不要拿他的著作来进行“哲学性”阅读或“理论性”阅读，这是因为他最想传递的是一种“科研惯习”，是一个普适的、对于社会学者这一职业必不可少的倾向性（disposition）系统。对理论至上主义的提防导致对经验主义的警惕：沉浸在经验现实中会使人自然而然地把观察到的案例建构为一种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又被置于一个可能出现的形势是被限定的世界中。

除了这些困难，还要加上国际观念贸易自身形成的一些障碍（Bourdieu, 2002）。除了语言障碍、民族主义障碍、偏见和刻板印象这些在知识生活中大概不比其他社会领域要少的问题，还有根植于国际观念贸易逻辑的误解的结构

性原因。借鉴了马克思的观念，布尔迪厄用“无上下文的文本流通”来分析这一结构性障碍。各国的知识领域的结构如同国际观念贸易中的一个文化中介；出口国的结构决定产品的形式，而接受国如同某种思维透镜一般挑选、曲解那些可以在它们自己的背景中找到共鸣的思想，并用地方上的理论方言把这些思想转译出来。然而，接受了这些进口观念的人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忽视了生产这些观念的场域，忽略了构想它们的场域在科学层面的可能性以及这些观念原本的意义和作用。在此之上，它们自发地依据接受地的场域结构重新阐发了这些观念，并通过感知模式和阐释模式把它们与接受地的背景联系起来。一个来自外国的文本所持有的意义和作用正是这样被确定下来的，至少无论对于接受地还是对于来源地都是一样的。“错位误读”效应与观念的国际化流通密不可分，这一效应基本上表明了引进著作在来源地的含义和客观地位与其接受者在接受地的立场不可避免的相互影响。与来源地的知识界在距离上的遥远和熟悉感上的缺失使人倾向于把布尔迪厄作品的复杂性归咎于巴黎知识界的特殊性（“法国例外论”）。翻译所固有的碎片化（正如与此相反的使一部著作的不同阶段同步化）使人们无法理解一个著作的阐释逻辑：它中

断的地方、它修正的地方、它重读和修改的地方。超越这些障碍意味着采用一种社会衍生学的角度来看待一部作品：超越关于一个国家内部生产场域的社会学和其中孕育的国家性的思维分类法。在这一视角下，人们应该把这一分类法解释清楚，通过研究教育制度史和文化生产的场域，使一个国家在文化上的潜意识结构浮出水面，而这正是思维体系的历史基石。这样，我们才可以把社会科学在超越各国内部知识生产场域界限而流通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扭曲误解变得显而易见，而这一过程可能可以抵消或者减少这些曲解。

但是，正因为“所有的科学都藏在某处”，又因为斗争的输赢才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我觉得理解布尔迪厄著作的主要困难不在于其复杂的句法和晦涩的措辞，不在于知识分子学究式的偏好，亦不在于国际观念市场的内在困难，而在于整个批判社会学事业所带来的困境。对其著作的理解消化首先碰触到的，是或多或少被牢牢内化的反对所有社会学尝试揭露内情时会遇到的阻力，这不仅仅是有时社会学质疑的一些关键利益，还有常识上的一些模式。社会学的工作很少使我们到达被称为清晰的境界，换句话说就是为情理之中的事情提供证据：主体性哲学和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幻觉都明显比社会学的客观化过程所带来的结果

离常识想法更近，所以“理性选择理论”也明显比“惯习理论”离常识的距离更近。此外，作为除魅者，社会学的主张经常被（错误地）视作囚禁在一种命运里，而社会学家也经常被看成扫兴者。与其说社会学真的是一门除魅或者灭圣的科学，不如说它其实是一门“扰人的科学”（Bourdieu, 1980）。因为它揭露出隐藏在背后的有时被抑制的东西，还因为它经常与统治者的利益相违背，部分由于这些利益隐匿于缄默的表面之下或于情理之后，而情理经常告诉人们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且无法是其他的样子。

热拉尔·莫热 (Gérard Mauger)

2016年4月于巴黎

参考文献

Bourdieu P., 1980, “Une science qui dérange”, in Bourdieu P., *Questions de sociologie*,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p. 19-36.

Bourdieu P., 1993, “Concluding Remarks: For a Sociogenetic Understanding of Intellectual Works”, in Calhoun C., LiPuma E., Postone M., *Bourdieu: Crit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ourdieu P., 2002, “Les conditions sociales de la circul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idées”, in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n° 145, p. 3-8.

Brubaker R., 1985, “Rethinking classical sociology: the sociological vision of Pierre Bourdieu”, *Theory and Society*, 14, n° 6, p. 745-775.

热拉尔·莫热 (Gérard Mauger)

社会学家，法国社会科学院荣誉研究员，欧洲社会学和政治学中心研究员，该中心为布尔迪厄联合索邦大学的政治科学中心共同创立的。莫热先生曾任教于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 (EHESS)、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ENS)，曾为“调查—田野理论” (Enquêtes terrains théories) 团队和“跨学科实践” (Pratiques de l'Interdisciplinarité) 硕士项目的成员。

莫热先生学术上的研究领域包括年龄和代际关系社会学、犯罪社会学、文化实践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并有著述十多本，如《年龄和代际关系》 (*Âges et générations*, Paris,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coll. “Repères”, 2015)、《青年犯罪社会学》 (*La sociologie de la délinquance juvénile*, Paris,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coll. “Repères”, 2009)、《读

者的历史》(*Histoires de lecteurs*, Paris, Éditions Nathan, coll. "Essais et Recherches", 1999)。此外,自20世纪80年代,他便作为布尔迪厄的合作者参与其团队的科研工作。在布尔迪厄逝世后,莫热先生撰写并组织出版了多部总结整理布尔迪厄学术遗产的论文集,如《遇见布尔迪厄》(*Rencontres avec Pierre Bourdieu*, Bellecombe en Bauges, Paris, Éditions du Croquant, 2005)和《阅读布尔迪厄》(*Lectures de Bourdieu*, Paris, Ellipses, 2012)。

序 言

随意性的永久化

在这本书中，我基于许多关于两性关系的研究成果，⁷明确、支持并修正了我从前对同一主题的分析。本书对性秩序的（观察到的或希望的）永久性⁸及变化问题提出了明确质疑，而这个问题也总是被大部分分析者（和我的批评者）不厌其烦地提到。也正是引入并规定这种天真的并天真地带有规范性的取舍，才导致不顾明显事实，把性结构以及性结构借以被认识的模式⁹的相对稳定性的证明，看作一种否定和谴责妇女状况变化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应该受谴责的，并立刻受到了谴责，它是虚假的，并立刻遭到了

对这种状况的所有变化之强调的驳斥。

8 对这个问题，也应该以另一个问题来予以反对，后者在科学上更恰当，并且在我看来，无疑在政治上也更紧迫：如果肯定这一点，即两性关系不像这种肤浅的观察让人以为的那样变化很大，而且为对于一个保存特别好的男性中心社会（比如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能够看到的卡比利亚社会）的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的认识，提供了若干工具，帮助理解这些关系在当代经济最发达的一些社会中的状况的某些掩盖得最好的特征，那么应当考虑，为性别划分结构和为相应观念原则的相对非历史化和永久化负责的历史机制是什么。用这些术语提出问题，标志着在认识范畴内的一种进步，这种进步可能是在行动范畴内的一种决定性进步的根源。在历史中表现为永恒的东西不过是一种永久化作用的产物，这种永久化作用由（互相联系的）机制如家庭、教会、国家、学校承担，但在另一个范畴内，则由体育运动和新闻业承担（这些抽象的概念是复杂机制的简单速记名称，应在每种情况下分别分析这些概念的历史特性），从而把自然主义的和本质主义观念从这些机制中抽取出的两性关系重新纳入历史，进而归还给历史——而不是如有人想让我说的那样，试图终止历史并剥夺妇女历史行动者的角色。

一项动员事业应该首先以反对这些非历史化的历史力量为导向，这项事业力求通过遏制历史的遏制机制，让历史重新发挥作用。这种特有的政治动员，为妇女提供了一种集体反抗行动的可能性，这种行动是以司法的和政治的改革为方向的。因此这种动员既反对所有关于两性差别的（生物学主义的和心理分析的）本质主义观念所鼓励的服从，也反对被归于个人行为或某些女权主义女理论家所主张的那些总是重复的不着边际的“偶然事件”：那些与强大的日常陈规决裂的事件，如同朱迪丝·巴特勒青睐的“滑稽表演”一样，无疑要求太多，而成果过于微薄，过于不确定。

要求妇女投入一项政治行动，并非要求她们与团结一致和互相支持的小集团的内倾反抗的诱惑决裂——无论这些小集团在家庭、工厂或办公室的日常斗争的成败中多么必要，都不像人们可能以为的或担心的那样，能够促使她们不经斗争就归附政治斗争的普通形式和规则，冒险加入并淹没在与她们自身的忧虑和利益无关的陌生运动中——而只是希望她们懂得参与到社会运动当中并依靠具有反抗性特征的组织，致力于创造并规定集体的组织和行动形式，尤其是具有象征性的有效工具，这些工具能够动摇促使她们的服从永久化的制度，而她们与同性恋者都是象征区别的特别目标之一。

前 言*

无疑，如果我不曾被我的研究的整个逻辑性吸引至此，¹¹ 我不会接受一个如此艰深的课题的挑战。事实上，我不断地在这个可以被称作信念的悖论（paradoxe de la doxa）的东西面前感到惊异：世界的本来秩序，连同它就本义或转义而言独一无二的、被禁止的意义，它的责任和制约，大体上是受到尊重的，其中并不存在很多违背或颠覆、不法行为和“疯狂”（只要想想巴士底广场或协和广场上五分钟的汽车通行意味着成千上万的意向——或意愿——不同寻

* 对我乐于向之表达谢意的人，我不大清楚——列举他们的姓名是否会给他们带来有益或有害的影响，因此，我仅在这里对给我提供证据、材料、科学参考及意见的他们，特别是她们，表达深深的感激之情。同时，我希望，这项工作，尤其是工作的成果，无愧于他们或她们对此抱有的信任和期待。